

CERI

长江教育研究院

Changjiang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教育智库
Thinktanks

2022年4月刊

总第46期

聚焦
两会

两会
专刊
(三)

两会 · 特别报道 两会 · 院长专访 两会 · 院长心声

目录 Contents

P01 卷首语

周洪宇：一名“老代表”的履职答卷

P04 两会·特别报道

听，公平质量的旋律高昂 ——两会内外热议五年来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教育主要任务

《政府工作报告》发布！周洪宇解读涉及教育的 14 处修改！

“双减”下一步如何继续？中考改革或是关键

代表委员热议非学科培训监管：不能简单照抄学科培训治理方法

P21 两会·院长专访

南方都市报专访 | 发展机构化长租房促进租房市场健康有序

羊城晚报专访 | 教师减负存在“此减彼增”现象

21 世纪经济报道专访 | 建议出台国家层面非学科类培训管理规范，尽快制定《校外教育培训管理条例》

中国社会科学网专访 | 构建湿地保护修复生态补偿机制

P46 两会·院长心声

办高质量教育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

分类厘清监管事权，提高非学科培训准入门槛

小学要不要上 6 年？人大代表议学制改革

要“双减”，不要增加教师负担

“IT 青年成涉诈 App 制刀者”现象引发多方关注

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加强源头治理“精准滴灌”

将湖北作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之心”来打造

建议灵活就业者用法律保护自己



欢迎与我们互动

一名“老代表”的履职答卷

来源 | 团结报



周洪宇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

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兼华中师大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院长

“做好答卷，不负时代。”当记者请全国人大代表、民进湖北省委会主委周洪宇用几个词来形容过去五年的履职时光，他给出了这样的答案。“过去的五年是我20年人大代表生涯的第四个任期。”周洪宇解释说，作为“老代表”，要时刻保持勤勉认真、谦虚谨慎，不断地沉淀积累再出发，以“伏枥老骥”

的精神，不负时代使命，不负人民重托，交出一份让党和人民满意的履职答卷。

自2003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以来，周洪宇每年都会提交20多份议案、建议。他的议案、建议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其中全国城乡中小学免除学杂费，义务教育阶段教科书免费，出台家庭教育促进法、长江保护法等建议都已落地成为现实。

这确实是一份写满收获的履职答卷。2008年第一次任期结束，周洪宇就出版了两本书，一本叫《怎样做人大代表》，一本叫《怎样写人大议案》。如今，第四届任期即将结束，周洪宇对人大代表的职责又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在十五年前出版的两本书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梳理总结20年全国人大代表履职的经验和体会，重新撰写了一套《如何当好人大代表丛书》，为今后新代表履职提供参考。

谈及多年来的履职经验，周洪宇总结了三点：做好选题、发挥专业优势、善于借助“外脑”。做好选题至关重要，周洪宇认为，要围绕党和国家重大战略、关键问题，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来调查研究、建言献策。

同时，一定要结合本职工作，发挥专业优势。在自己熟悉、擅长的工作领域，有研究基础，情况摸得清、看得透，提出的建议才能够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如果仅仅是奔着热点去，只能是拾人牙慧，重复别人的观点建议，就起不到议案建议该有的作用。”周洪宇强调。

此外，还要善于借助“外脑”，个人的知识领域和视野是有限的，提出高质量的建议需要借助相关领域专家的智慧 and 力量。结合自身经验，周洪宇表示：“我在提出立法修法方面的议案建议时，就请教了很多法律方面的专家学者，使自己的建言能够讲得透、立得住。”

“20年的履职生涯中，我提交了430份左右议案建议，”

周洪宇说，“其中7成以上都是教育方面的。”教育一直是他最关心的领域，今年备受关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的落地，背后也有着周洪宇在2019年和2020年的持续推动。

多年来，让周洪宇印象最深刻的议案、建议有三件：第一件是2003年提出的《关于实行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完全免费制的建议》，这是他在两会上提出的第一个建议。“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到湖北代表团参加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我亲手把建议递交上去，得到温总理的赞许和采纳，给了我莫大的鼓舞。”周洪宇回忆说。

第二件是2008年提出的《关于建立国家教育公务员制度的建议》，周洪宇连续多年不断完善建议内容持续进行呼吁。2018年，国家公布的《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到“确立公办中小学教师作为国家公职人员特殊的法律地位”。这是确保广大中小学教师社会地位、经济待遇所迈出的重要一步。

第三件是2011年3月全国两会上提出《关于建立国家教师荣誉制度的建议》，2012年9月写入中央文件《国务院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

今年全国两会，周洪宇带来了6个议案、21份建议。热门话题“双减”政策是周洪宇今年的一个关注重点。周洪宇指出，“双减”政策落地之后，如何构建一个良好的教育生态，这不只是教育部门的事，也涉及文旅部、科技部等多部门的合作。他举例说，政策实施后，必须加强对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的管理，这就需要多部门协作，明确准入门槛，出台相关文件，让之后的规范和惩罚有据可依。

“我们现在遇到了一个大时代、一个好时代，这个时代给无数知识分子都提供了施展才华的空间和机会。”周洪宇说。

听，公平质量的旋律高昂——两会内外热议五年 来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教育主要任务

来源 | 中国教育报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公平质量，一体两翼。

“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教育公益性原则，着力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2021年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时的这一重要论述，为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行动方向。

5年来的全国两会，“公平”与“质量”两个关键词始终贯穿政府工作报告的教育部分。踔厉奋发，教育战线始终心怀“国之大者”、聚焦民生关切，着力发展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笃行不怠，代表委员们坚持为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建言献策，合力书写新时代新辉煌。

公平质量，中国教育的两大战略任务

每年两会，教育话题都会受到关注，无论是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落实教师工资待遇，还是改善职业教育办学条件、支持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均被会场内外反复提及、热烈讨论。

“一方面，教育是‘民生之基’，对学生个人和家庭未来有着深远影响，历来都是政府工作报告民生工作中的第一项议题；另一方面，教育更是‘国之大计’，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院长周洪宇看来，之所以大家如此重视教育，是因为当今世界的竞争，说到底人才竞争、教育竞争。必须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和智力支撑。

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对提高人民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增强中华民族创新创造活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马陆亭指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主要是靠第四轮科技革命来推动，其中，教育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在教育与社会关系的版图上，基础教育有着为人的一生成长奠基的作用，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是青年一代通向社会的双车道，继续教育则能为人提质赋能补充营养。

从2018年的“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2019年的“发展更加公平更有质量的教育”，到2020年的“推动教育公平发展和质量提升”、2021年的“发展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再到2022年的“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5年来，政府工作报告连续强调教育的“公平”和“质量”。从“公平”到“更加公平”，从“更有质量”到“更高质量”，国家对教育发展的要求也在渐次提高。

“这说明，当前中国教育的两大战略任务就是公平与质量。”周洪宇指出，每年落实这两大战略任务的政策措施是不一样的，2020年用的是“推动”教育公平发展和质量提升，2021年写的是“发展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今年用“促进”，这些细微的变化也反映出教育改革程度的加深。

五年来，我国教育公平实现新跨越，历史性地解决了“有学上”问题，正向着更好地实现人民群众“上好学”的愿望迈进。周洪宇强调，“公平”与“质量”二者是紧密结合的，必须树立新时代教育公平观和教育质量观，在促进教育公平的过程中不断提升教育质量，在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进程中追求更高水平的教育公平。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秘书长、教育部原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力指出，在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形势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确定“十四五”时期教育事业的主要目标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强调“坚持教育公益性原则，

深化教育改革，促进教育公平”，对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教育新格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新征程上，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是国家发展之需，也是人民群众之盼

1 根网线，16 年光阴，180 多个账本，记录着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龙舟坪镇花坪小学副校长刘发英的教育扶贫故事。

为了不让农村孩子辍学，2005 年刘发英通过网络寻求帮助，后创办“英子姐姐”助学网站。如今，刘发英的助学团队累计筹集助学善款 2900 多万元，帮助 4300 多名贫困学生上学读书。同时，政府工作报告显示，去年国家助学贷款每人每年最高额度增加 4000 元，惠及 500 多万名在校生。

让每个孩子都拥有人生出彩的机会，是教育公平的题中之义。

回望奋进足迹，到 2021 年，全国有各级各类学校 52.93 万所，在校生 2.91 亿，各级教育普及程度达到或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控辍保学工作成效显著。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 88.1%，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5.4%，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 91.4%；超额完成高职扩招三年行动目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 57.8%，进入普及化阶段。国家提高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补助标准，3700 多万名学生受益。这一串数字，彰显着“办人民满意的教育”的初心与决心。

成为服务国家战略的“快变量”，是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展望未来征程，以雄安新区、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海南自贸区、“一带一路”和中西部地区“四点一线一面”为重点的区域教育创新试验，形成点线面结合、东中西呼应的新时代教育发展格局。“1+X”证书制度试点、“双高计划”、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等重大改革，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企业深度参与协同育人成效明显。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双一流”建设成果初显。在 3 月 8 日的“部长通道”上，记者获悉了一个好消息：我国国家创新指数全球排名从 2012 年的第 34 位提高到了去年的第 12

位，提高了22个位次。大学、科研院所等，正将中国的科技事业推向高潮。着眼大格局，以大担当融入大战略，高质量教育体系前景可期。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如何回应人民群众对更加公平更高质量教育的期待？多位代表委员表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政府工作报告为教育工作划出重点，指向的也正是实现更加公平更高质量教育的重点难点。”

面对幼有所育的期盼，全国政协委员、辽宁省政协副主席姜军说：“在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的背景下，进一步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是学前教育发展的新课题。”

“一个县的文化制高点就是县高中，如果高中办得好，那一定就是当地精神文明的高地。”全国人大代表、东北师大附中校长邵志豪说，“我今年主要就是围绕县域普通高中建设的话题，建议推进教育基础薄弱县高中一对一帮扶。”

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全国政协委员、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副校长许玲深感责任重大：“升级职教本科，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是智能化数字化背景下产业发展的迫切需求，是国家战略的教育担当。”

面对国家自主创新的需求，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长王焰新表示，我国学术成果和影响力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的杰出人才在高校仍然十分短缺，协同解决“卡脖子”技术难题的一流人才十分短缺。

守正创新，着力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

教育承载了每个家庭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驶入新时代的教育，必须深入推进改革，守正创新，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

促公平、提质量，需要学前教育普及普惠昂首向前。

“提高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不仅要抓好硬件，还要重视软件，解决好公办园合同制教师工资待遇问题，提高幼儿教师的职业幸福感。”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管培俊联合11名政协委员建议，补齐学前

教育师资的短板与弱项，出台幼儿园教师编制标准，从根本上破解编制不足的难题。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蚌埠第一实验学校教育集团总校校长崔建梅也认为，目前公办幼儿园缺编严重造成教师队伍不稳定，建议更新公办幼儿园教职工编制标准，提高对聘用幼儿教师的待遇，实行同工同酬，全力保障学前教育科学发展。

促公平、提质量，呼唤基础教育优质均衡步稳蹄疾。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这意味着，未来有更多农村学生能享受高质量的义务教育。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志勇认为，在教育资源配置上，必须变城镇学校不断从乡村学校抽取优秀教师，为城镇学校优秀校长教师反哺、支持乡村学校；在办学标准上，变城乡学校统一办学条件标准，为乡村学校弱势补偿，用更高的资源配置标准支撑乡村学校的发展。

县域教育是中国教育的底色，县中振兴路在何方？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龙川县田家炳中学校长李舒强建议，严防“掐尖”现象，加大对违规招生行为的查处力度。在教育投入方面向县中倾斜，逐步缩小县域普通高中与城市高中教师待遇差距。

促公平、提质量，强调职业教育完善体系聚势而起。

作为与经济社会联系最为紧密的教育类型，职业教育如何提升质量？全国政协委员、中华职业教育社副理事长苏华认为，职业教育要坚持以产业发展战略需求为导向，围绕高端装备、国防军工、航空航天等产业，深化产教融合，建设产学研一体化的职教联盟、行业技术中心、重点实验室等平台，加快培养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急需人才。

许玲建议，政府要牵头制定可操作性强的产教融合实施细则，找准教育规律和经济规律的契合点，搭建企业和院校的桥梁，通过金融、财政、土地、税收组合拳的方式，推动产教融合真正落地。

促公平、提质量，要求高等教育内涵发展奔向一流。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支持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在全国政协委员、河南大学校长宋纯鹏看来，这是解决高等教育发展不均衡的实质性举措。“建议在政策支持上，尤其在人才培养结构、高层次人才聚集等方面，应考虑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精准施策。”宋纯鹏表示。

“高校‘双一流’建设在资源配置中必须坚持‘扶优、扶强、扶特、扶新’，突出建设重点，着力破解发展中的瓶颈问题。”全国人大代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长吴普特建议，一要支持建设一流学科率先发展，以一流学科建设引领带动学科整体建设水平提升；二要强化学科生态建设，提升基础学科建设水平，大力培育新兴交叉学科；三要打造高水平师资队伍，突出社会急需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同时，建设高校也要充分发挥专项经费的引导作用，扩大社会合作，积极争取地方、企业和社会的协同持续投入。

促公平、提质量，期待教师队伍强基固本人才辈出。

教师队伍是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的根本保障，师范类高校是培养高素质教师的主力军。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程建平认为，要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建设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积极调整完善培养方案，构建面向未来的卓越教师培养模式，全面提升师范生的综合素养，倾心培育引领未来教育变革的“大先生”和“教育家”。

“要在提高教师工资待遇上下功夫，也要在加强人文关怀上出实招。”张志勇建议，从减轻教师非教学工作量、适当降低教师教学工作量、减轻教师工作压力3个方面入手，全面减轻教师负担，调动广大教师教书育人的积极性。

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我们矢志接续奋斗！

《政府工作报告》发布！周洪宇解读涉及教育的14处修改！

来源 | 中国教育报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一共修改了92处，教育部分的修改有10处，其他领域涉及教育方面的修改还有4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进湖北省委会主委周洪宇认真对比、研究了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每一处修改，并用特殊的符号标注出涉及教育的内容。

一图看懂政府工作报告教育部分修改内容

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依据常住人口规模配置教育资源，保障适龄儿童就近入学，**解决好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就学问题**。全面落实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待遇，加强乡村教师定向培养、在职培训与待遇保障。继续做好义务教育阶段减负工作。多渠道增加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加强县域普通高中建设。办好特殊教育、继续教育、**专门教育**，**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发展**。提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程度和质量。**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改善职业教育办学条件，完善产教融合办学体制，**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加快培养理工农医类专业紧缺人才，支持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高校招生继续加大对中西部和农村地区倾斜力度，**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发展在线教育**，**完善终身学习体系**，**倡导全社会尊师重教**。我国有2.9亿在校学生，要坚持把教育这个关于千家万户和中华民族未来的大事办好。

（红字为修改内容）

“教育部分的修改是重中之重，这体现出党和国家将教育优先发展摆在突出位置，同时也体现了中央对整个教育工作富有前瞻性的战略思考。”周洪宇分析，“新时代，我国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教育作为基础性工程，必须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教育内容，就是教育在新时代的新使命。”

这些修改，透露出什么信号？

彰显人民至上的教育核心价值观

“修改首先彰显了人民至上的教育核心价值观——教育以人民为中心。”周洪宇发现，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关于教育公平的表述中，“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依据常住人口规模配置教育资源，保障适龄儿童就近入学”这句话之后，增加了一句更加明确的内容，“解决好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就学问题”。

“这句话特别强调了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教育公平问题，凸显了适龄儿童中的重点群体。”周洪宇说，“这句话更有针对性和导向性，更能体现我

们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与此同时，政府工作报告还提出，“办好特殊教育、继续教育”。“特殊教育面向的是社会弱势群体，要办好；继续教育中包括了成年人和老年人，也要办好。”在审议通过的报告上，周洪宇用红笔圈出了“专门教育”4个字，这是特别增加的一项内容。

2019年，中办、国办下发了《关于加强“专门学校”建设和专门教育工作的意见》。2020年新修订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四十五条规定，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经过评估，应由教育行政部门会同公安机关，将其送入专门学校接受教育。

“特别增加‘专门教育’，就更加明确了教育不能遗漏任何一个孩子。换句话说，每一个教育群体的受教育权利、受教育机会和受教育质量都要得到保障。”周洪宇对此感慨万千，“这正是回应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强调的，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幼有所育、学有所教，教育作为民生保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在不断适应人民在新时代的更高期待。当前，面对我国新生人口减少以及老龄人口增加的新形势，党中央对教育提出了更加深远的战略性任务。

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医疗卫生服务部分，增加了“加强健康教育和健康管理”；在有关养老服务部分，增加了“创新发展老年教育”；在完善三孩生育政策配套措施方面，将“减轻家庭养育负担”修改为“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

“这些都属于大教育的范畴。虽然是在其他部分出现，但这些都是有关教育的内容。”周洪宇再次强调，“这是人民至上的教育核心价值理念的充分体现，涵盖了教育的各个方面、各种类型、各个阶段。”

此外，有关未成年人保护的内容也有所修改。政府工作报告中原本提出的“强化未成年人保护”被修改为“强化未成年人保护和心理健康教育”。

“特别把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教育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体现出中央对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视。”周洪宇表示，“从这些修改的内容来看，人民

至上的教育核心价值观，在教育部分进一步强化，在其他领域也进一步彰显。”

体现教育发展战略思维、系统观念

“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教育内容的修改，进一步体现了对教育的战略思维和系统观念。”在周洪宇看来，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内容和表述是否修改、是否补充、是否加强，都有着深层次的战略布局和系统考虑。

谈到报告中战略思维的鲜明体现，周洪宇明确指向教育部分的最后一句话——“我国有 2.9 亿在校学生，要坚持把教育这个关乎千家万户和中华民族未来的大事办好。”

“怎样才能将涉及 2.9 亿在校学生、关乎千家万户和中华民族未来的大事办好，报告的修改要通过战略思维，以前瞻性的眼光，从整体上和大局上来考虑。”周洪宇分析，因为教育是一个涉及方方面面的大系统，既包括正规教育和正式教育，也涵盖非正规教育和非正式教育；既包括学历教育，也包括非学历教育。

周洪宇注意到，教育部分专门增加了“发展在线教育。完善终身学习体系”。

“此处细微而重大的调整，意义非凡。”周洪宇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一直高度重视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和建设学习型社会工作。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发挥在线教育优势，完善终身学习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发展在线教育将推动终身学习‘立交桥’更加畅通。”他说。

从家庭教育中的生育、养育、教育到学前教育，从义务教育、高中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师教育到特殊教育、继续教育、专门教育、老年教育，“政府工作报告对于教育工作的全面部署，体现了国家对各级各类教育的关注与支持，更彰显了一种大教育观和系统观念。”

在政府工作报告关于民办教育的表述中，虽然只增加了“支持和”这 3 个字，却令代表委员非常欣慰。“民办教育确实需要规范，但同时也要支持。”周洪宇说，很多代表委员在讨论中观点一致。最终，“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发展”出现在正式报告中。“这也体现了中央对民办教育的全面认识和公平

对待，让民办教育者有更大热情和更多信心发展民办教育。”周洪宇分析。

对于职业教育，报告在原本内容“改善职业教育办学条件，完善产教融合办学体制”的前后分别增加了“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与“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

“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工作重点。加上这句话，能够明确地体现出，国家对职业教育的总体战略规划没有变。”周洪宇分析，“能够明确看出过去、当前和未来职业教育的工作基调和发展力度的一致性。”

在2021年全国职业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职业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提出要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

“‘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的加入，表明职业教育发展不仅需要体系上有变化，而且在体制、内容和教学方式上也要改革。”周洪宇分析，职业教育要能够适应国家社会的发展需要，既要培养大批技能型的应用人才，又要在一些领域培养具有创造性的高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培养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大国工匠”。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既提出了“全面落实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待遇，加强乡村教师定向培养、在职培训与待遇保障”，又增加了“加强师德师风建设”与“倡导全社会尊师重教”。

“这两处修改，强调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全社会都要尊师重教，另一方面是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周洪宇分析，这两处恰好与前文中的“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前后呼应，形成了完整的逻辑体系。

明确构建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新格局

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教育部分中，高等教育一共涉及6个方面——“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加快培养理工农医类专业紧缺人才，支持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高校招生继

续加大对中西部和农村地区倾斜力度。”

“关于高等教育的任务占据了大部分篇幅，进一步体现了中央对高等教育在新时期新阶段的期待和重视。”周洪宇发现，这部分还增加了一项重要内容，即“优化高等教育布局”。

为什么要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周洪宇分析，当前，世界疫情和百年变局相互交织，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对中国高等教育提出了全新的要求。我们必须加快教育布局结构的调整，推动高等教育实现内涵式发展。“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不能只停留在规模扩张上，而是要加强基础学科、应用学科和交叉学科设置和建设，要加快培养理工农医类专业紧缺人才，等等。”他说。

“优化高等教育布局重点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层次类型与学科专业布局，另一个是空间区域布局。”周洪宇分析，在层次类型与学科专业布局方面，需要动态调整、优化学科专业，探索建立基础学科、应用学科、交叉学科分类发展机制，引导高校主动服务国家和区域发展，完善学科专业设置办法和程序。

近年来，中央提出要加强城乡建设、应急管理、公共安全等领域相关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支持行业特色院校发展。“高等教育要通过调整学科专业设置，提升教育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能力。”在周洪宇看来，“优化”包括了优化、调整、升级、换代、新建，要鼓励高校学科专业设置适应经济、社会、科技发展新需求。

对于优化高等教育空间区域布局，周洪宇分析，长期以来因为我国东中西部资源供给与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我国高等教育呈现出“东高西低”。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立足服务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加快形成点线面结合、东中西呼应的教育发展空间格局，提升教育服务区域发展战略水平。

“优化高等教育区域布局，推动教育协调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新发展理念中的协调发展理念在教育中的体现。”周洪宇说，对于中西部教育的支

持，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有直接体现，即“支持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和“高校招生继续加大对中西部和农村地区倾斜力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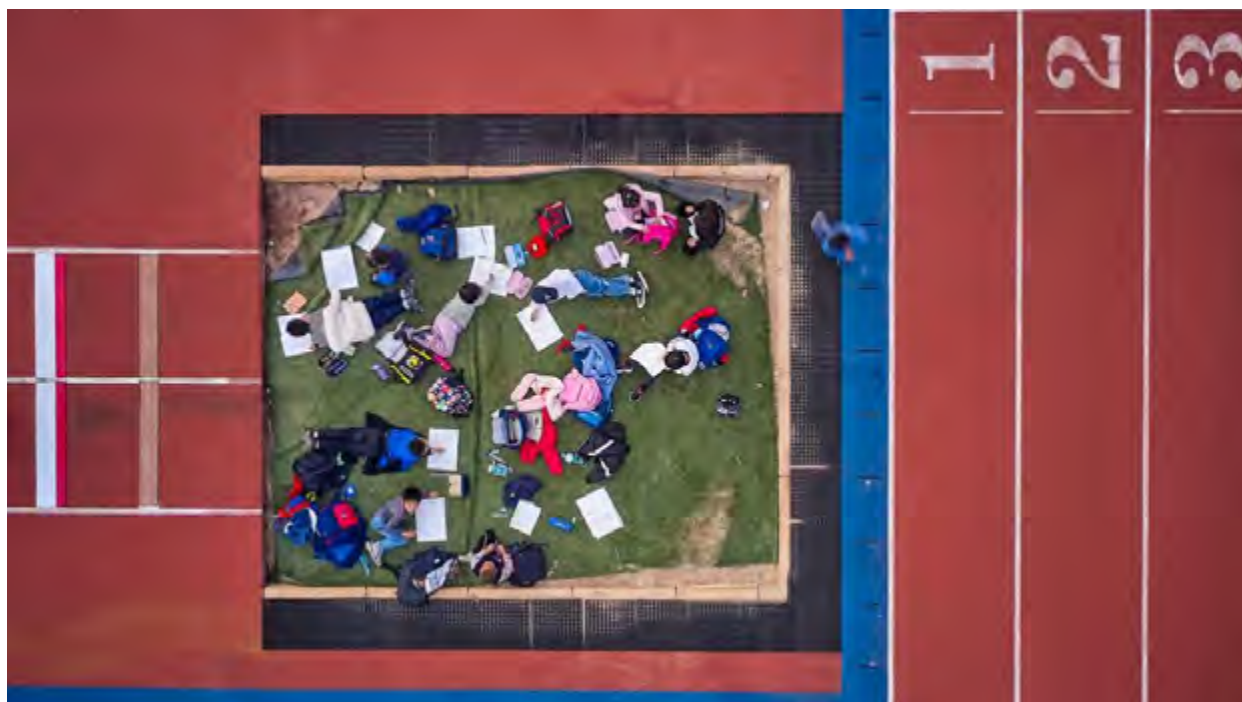
梳理近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周洪宇说：“‘支持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和‘高校招生继续加大对中西部和农村地区倾斜力度’这两句话几乎每年都会写入报告。这既体现了协调发展理念，也体现了教育公平观。”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报告中有14处对教育内容直接或间接的修改，真是太不容易了！这是国家对教育实实在在、真真切切的重视。”作为人大代表，周洪宇反复翻看这份审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激动地说：“我们对国家的未来发展更有信心！”“建议教育部在2022年中考之前出台相关政策意见，通过明确‘谁来组织’‘命题的方向、原则、内容’‘命题人员构成’等核心问题来全面统筹和监管各省市中考。”



“双减”下一步如何继续？中考改革或是关键

来源 | 南方周末



2021年11月25日，福建泉州，洛江区实验小学

“建议教育部在2022年中考之前出台相关政策意见，通过明确‘谁来组织’‘命题的方向、原则、内容’‘命题人员构成’等核心问题来全面统筹和监管各省市中考。”

“建议出台非学科类培训机构设置标准和审批监管工作细则，给学科类培训机构分流转型提供通道，减少优质教育资源的流失，切实关切其调整期阵痛，支持帮助渡过难关。”

2022年全国两会，在教育领域，代表委员们建言献策最常提到的关键词，是“双减”。

教师弹性上下班制度如何落地，“双减”之后的中考改革何去何从，校外培训监管的进一步规范有哪些重难点……代表委员们针对这些焦点问题提

出了各方面建议意见。

“双减”落地已有七个多月，接下来如何推进，需要克服哪些问题，南方周末邀请了三位教育界的代表委员，共话“双减”下一步。

刘希娅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谢家湾小学校长

周洪宇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

朱晓进 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

“建议全面推进教师弹性上下班制”

南方周末：“双减”政策落地，关键在教师。课后服务时间延长，教师负担加重。这一现象普遍存在吗？

刘希娅：近年来，一线教师工作负担过重、健康状况频发，已成为社会共识。由于教师工作的特殊性，表面上看一位教师一周的课时数不多，但是其背后的教研、备课、批改作业、培优补差、学生管理与教育、家校沟通等，要消耗大量时间和精力。

“双减”之下，教师需要在课后指导学生完成当日家庭作业，还要带领学生开展科普、文体、艺术、劳动、阅读、兴趣小组及社团活动等。课后服务进一步延长了教师在校工作时间，加大了教师工作量，虽然学生实现了“双减”，但教师的工作却有所增加，这让原本就超时超负荷工作的教师更加辛劳，不利于教师各项工作的开展，降低了教师工作成效。

周洪宇：我们在走访调研中发现，“双减”之后，教师负担加重是一个客观现实问题。“双减”落地之前，受诸多方面的影响，教师职业倦怠问题已日益凸显，职业幸福感降低，成为制约基础教育持续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性问题。

“双减”实施后，随着工作时间加长，责任加重，压力加剧，隐形工作量加大，工作要求加高，对老师的职业倦怠和职业幸福感的问题，更提出了严峻的考验与挑战。

“双减”不能让学生负担减轻了，教师负担却持续加重。

南方周末：现在教育行政部门、专家学者也提出各种办法减轻教师负担。“双减”文件中有关课后服务的内容指出“学校可统筹安排教师实行‘弹性上下班制’”。你认为减轻教师负担的关键在哪？

周洪宇：首先，教师待遇是学校教育和课后服务质量的根本保证。我们建议适当上移财政责任，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由中央和省级政府重点承担缩小同一省域内不同县（区）域教师收入差距的责任，保障同一省域内中小学教师收入大致相同。

其次，各地区各部门必须保障参与课后服务的教师在获取报酬、绩效考核、职称评定、奖励评优等方面的权益。

一方面要保障和鼓励教师的权利，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借力”来减轻教师负担。比如，探索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适当引进具备资质的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参与学校课后服务，并由属地教育主管部门建立遴选、评估和退出机制。

刘希娅：为回应广大教师呼声，体现对教师的关心关爱，同时提升教师队伍工作效能，我建议全面推进教师弹性上下班制。

推进过程中建议采取以下措施：首先，充分尊重教师自主权利，是否弹性上下班应由教师自主决定。其次，统筹考虑班主任和语文数学教师等特殊群体，例如通过设置副班主任，让班主任也有弹性上下班机会，允许因课后服务导致下班时间较晚的教师早上延时到校。最后，引进社会资源开展课后服务，让教师有更多时间用于教学研究、自我调控等。

“指挥棒”改革需要考学相配

南方周末：很多学生和家长对“双减”落地喜忧参半。喜的是学业负担确实减轻了，忧的更多是“双减”之后，中小学的评价考核机制及目标并没有根本改变。因此，有不少声音在期盼“双减”下一步能深化到“指挥棒”改革。

朱晓进：“双减”未能有效衔接教育评价改革，全面落实有难度。

当下减负政策全面落实的社会协同力不强，高考、中考指挥棒的导向，叠加优质教育资源的不足，给部分家长带来的困惑和焦虑难以消除。有家长用请家庭私教取代过去的校外培训，费用翻番，负担更重。

刘希娅：由于中考改革的高利害性，其涉及利益主体多而复杂，部分考试改革政策还未真正落实，因此，需要进一步优化中考机制，促进“双减”政策的进一步落地。

南方周末：中考现状存在哪些问题？

刘希娅：我在调研中发现：中考命题环节，存在各省市试题质量不一、相关群体利益链接等问题。中考招录过程，则存在跨区掐尖、指标到校落实不到位等现象。竞赛获奖作为中考招录时的一项参考依据，不利于教育生态的持续改善。

以命题为例，目前中考命题工作，全国有部分区域以省级为单位组织命题，还有部分区域以地市级为单位组织命题，各省、市在中考命题上的导向性和科学性存在差距。部分省、市命题中标准化的试题形式偏多，还有超标、机械记忆的题目，导向学生机械刷题，无法发挥试卷命题的促研促教促学作用。

南方周末：对解决这些根本问题，你有什么建议？

刘希娅：命题方面，建议教育部在2022年中考之前出台相关政策意见，通过明确“谁来组织”“命题的方向、原则、内容”“命题人员构成”等核心问题来全面统筹和监管各省市中考。

目前绝大部分省市考试评估机构隶属于当地教育科学研究院或隶属于当地教师进修学院。建议各省市设立教育评估监测机构，体现其独立性、专业性和权威性。

朱晓进：建议统筹治标与治本，同步推进教育评价改革与“双减”政策落地。

“双减”不是目的，培根铸魂、启智润心，实现立德树人目标才是根本。为此，要切实落实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精神，推进义务教育综合素质评价标准落地，同步深化高考中考改革，确保命题方向与“双减”精神相

吻合，让考与学相匹配。

给学科类培训机构分流转型提供通道

南方周末：校外培训监管依然是“双减”工作中的重难点。一些地方非学科培训机构存在日常监管不到位、部分机构资质不全问题，而以“高端家政”等名义违规开展学科类校外培训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对此，你怎么建议？

周洪宇：我们统计，目前全国已有21个省份明确了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的相应主管部门，仍有多个省份没有明确主管部门。大部门省份未出台非学科类培训机构分类设置标准和审批流程。

除了国家体育总局发布了《课外体育培训行为规范》，浙江等部分省市和个别试点地区的文旅部门、科技部门会同教育部门发布了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管理规范外，大量存在的体育类、文艺类、科技类培训机构暂时缺乏国家层面的行业规范指导意见。

现在也有一些培训机构刻意对体育、艺术进入中考政策进行过度解读，导致部分体育、艺术类培训项目需求较为旺盛，价格较快上涨。

在强化日常监管方面，我提议从国家层面出台非学科类分类管理规范，分类厘清教育、文旅、体育、科技等部门的监管事权。推动有关部门加强对体育、文旅、科技等非学科类培训的日常管理，形成协同管理的合力，实现常态化监管。

朱晓进：校外培训机构转型分流管理办法尚未出台，后续审批监管维稳难度大。

我建议出台非学科类培训机构设置标准和审批监管工作细则，给学科类培训机构分流转型提供通道，减少优质教育资源的流失，切实关切其调整期阵痛，支持帮助渡过难关。“双减”政策实施之后，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被大力压减，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持续升温。不少学科培训转型为非学科培训，资本涌入，教培行业似乎要迎来新的“风口”。

代表委员热议非学科培训监管：不能简单照抄学科培训治理方法

来源 | 民生周刊

随着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的深入，发现一些地方的非学科类培训日常监管不到位，部分机构资质不全，培训人员鱼龙混杂，预收费监管不完善，部分培训机构借“双减”之机肆意涨价、过度营销、制造社会焦虑……这些问题已经引发各方关注，非学科类校外培训今年将成为监管重点。

但与学科类培训相比，非学科类培训门类更多，更复杂，既不能放任其野蛮生长，也不能因噎废食，如何加强监管值得探究。在今年的两会上，很多代表委员就此提出建议，希望教培行业校正发展方向，朝着规范、健康的道路发展。

非学科校外培训发展误区

非学科类校外培训门类繁多。据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办教育协会会长刘林调研，目前全国有涉及非学科类校外培训业务的机构 30 万家，其中依托体育、科技、文化等本行业主体业务，开展体教、科教、艺教、产教融合业务的兼营机构占总数一半以上，大大小小的专业门类千余个，从业人员数以百万计。

刘林认为，作为校内教育的有益补充，非学科校外培训不仅缓解了校内非学科教育师资、场地、经费不足与群众子女广泛、多样需求之间的矛盾，而且为广大青少年的全面发展、拔尖创新人才的个性化成长、人口综合素质的不断提高以及相关产业发展、专业人员就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但不容忽视的是，当前非学科校外培训发展中也有着诸多问题。

刘林指出，很多非学科培训机构的主管政府部门不明确，行业管理不到位，市场准入与监管制度不健全，对一些有必要实施许可证的事项没有建立审批制度，价格监测与指导机制不完备，质量认证、信用评价机制缺失。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发现，目前全国已经有 21 个省份明确了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的相应主管部门，仍有多个省份没有明确主管部门；大部门省份未出台非学科类培训机构分类设置标准和审批流程；除了国家体育总局发布了《课外体育培训行为规范》，浙江等部分省市和个别试点地区的文旅部门、科技部门会同教育部门发布了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管理规范外，大量存在的体育类、文艺类、科技类培训机构暂时缺乏国家层面的行业规范指导意见。

周洪宇指出，“双减”政策实施后，非学科类培训机构大量增加。一些培训机构刻意对体育、艺术进入中考政策进行过度解读，制造焦虑，导致部分体育、艺术类培训项目需求较为旺盛，价格较快上涨，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双减”成效。

“一些资本有意投向素质类、职业技术类机构可能会引发过度逐利的潜在风险。”刘林说。此外，他发现，一些机构不规范、不诚信办学，虚假宣传、价高质低等侵害消费者利益的问题时也时有发生。

分类管理，精准施策

非学科培训的发展存在问题，需要治理，但不能简单照抄学科类校外培训的治理方法。刘林认为，学科教育与校内教育同质化特征强，但大多数非学科校外培训与校内教育差异性大，互补性强，而且不属于刚需，不会造成内卷。“应当看到非学科校外培训的积极作用，以引导其有序、健康、持续发展为政策目标，千万不能图省事，不去想办法引导，一减了之，更不能片面夸大其负作用，一棍子打死。”

“非学科校外培训门类众多，专业性强，应当根据各学科门类的不同特点，实行分类管理，精准施策。”刘林强调。

具体来说，对与中考、高考关系密切的非学科培训，可以参照学科类进行管理。对于其他门类的非学科校外培训，应当遵循发展规律和实际需求，以多样化手段引导其健康发展。

他希望，校外培训机构也能端正办学目的，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通过支持行业组织研制服务标准、建立第三方质量评估和信用评价机制、实行黑白名单制度等行业自律手段，引导校外培训机构主动自律、健康发展。

提高行业准入门槛

租个场地，招几个人就可以开一个培训机构，然后招学员，收学费，用学生预付的课时费维持运转甚至扩大规模，这是很多培训机构的运营方式。一旦出现资金链断裂，关门跑路，造成大批家长退费难。今后，这种模式行不通了。

刘林提出，要从明确业务归口主管部门入手，对必须监管的重点科类，从规范机构设置标准、从业人员资质等方面入手，提高市场准入门槛。

周洪宇建议完善校外培训机构审批登记，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严格审批，除对基本的办学许可证、办学场所面积、开办资金、消防许可、师资配备提出要求外，也要对培训机构预付费保证金和后续设置专门的银行托管监管账户提出相关要求。

“针对非学科校外培训的老问题和新苗头，从健全预收费资金监管机制、收费标准公示办法、招生广告宣传备案制度等方面着手进行规范。”刘林说。

在他看来，非学科校外培训机构众多，形式多样，市场化程度高，情况复杂，如果全部全面全方位实施监管，行政成本收益不成正比，应该抓关键促规范，维护群众根本利益。

常态化监管

执法人员来了，装模作样。执法人员走了，一切照样。在校外培训机构治理中，“一阵风”、“运动式”的监管收效甚微。

周洪宇强调，要强化日常监管。他建议从国家层面出台非学科类分类管理规范，分类厘清教育、文旅、体育、科技等部门的监管事权，推动有关部门加强对体育、文旅、科技等非学科类培训的日常管理，形成协同管理的合力，实现常态化监管，全面规范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培训内容、财务收费、安全管理等。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将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全额纳入监管范围。”周洪宇提出，培训机构应缴纳预收费风险保证金，最低额度应该不低于培训机构收取的所有学员单个收费周期（3个月）的费用总额。学员缴纳的学费必须打到监管银行的指定账户，课消三个月后经过申请才能打到机构账户。

刘林提出对校外培训机构建立价格动态监测机制，必要时依照《价格法》特别规定进行及时调控。

周洪宇表示，有关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要加强对培训机构的价格管理，遏制非学科类培训市场营销急速升温、价格过快上涨，减轻家庭经济负担，确保“双减”政策见效。

发展机构化长租房促进租房市场健康有序

来源 | 南方都市报

当前年轻人租房时间越来越长，接受租房 5 年以上的占比达到 51%；同时，市场的租赁住房仍大量存在于个人房东手中，这类存量房的房龄 20 年以上占比超过 65%，其中约 40% 存在设施陈旧、装修老化、户型不匹配等问题。《2021 中国城市租住生活蓝皮书》显示了目前的租赁市场现状。

面对长租房市场中的需求、供给矛盾，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在去年“两会”期间，提出要培育专业化、规模化的长租房企业等建议。他认为，加快发展长租房市场，尤其是机构化长租房，是推动完善住房租赁体系，及解决居住问题的主要工作思路。

南都：就长租房的发展，中央层面有多个表态：比如去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完善长租房政策”“规范发展长租房市场”；今年两会上又提出“加快发展长租房市场”。请问，从“规范发展”到“加快发展”，这一提法的



转变背后释放出什么信号？

周洪宇：中央始终将住房租赁摆在重要位置。2017年中央提出“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首次将“租”置于“购”之前，代表着租房已成为重要的居民生活方式。

2021年全国两会首次提出“长租房”，指出要“完善长租房政策”，意味着长租房作为住房租赁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已受到政府部门的关注和重视。今年两会提出“加快发展长租房市场”，从“规范发展”到“加快发展”提法的转变，意味着长租房在这一年已取得重大突破，长租房市场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加快发展长租房市场，尤其是机构化长租房，是推动完善住房租赁体系，及解决居住问题的主要工作思路。

南都：现阶段，您对“加快发展长租房市场”有哪些建议？

周洪宇：首先，要完善住房租赁法规，为规范长租房市场发展提供法律保障。一是国务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加快制定出台《住房租赁管理条例》，规范住房租赁市场行为和市场秩序。二是制定长租房行业标准，建立长租房行业的机构准入条件和退出机制；制定长租房规划指引，明确设计及公共配套标准等。三是完善住房租赁企业及房地产经纪机构实名备案制度；住房租赁企业及从业人员信用评价制度等。

其次，要大力培育专业化、规模化的住房租赁企业。一是支持专业化住房租赁企业发展。国家发改委可将规模化的品牌长租企业纳入政府重点扶持的范围，在政策、资金、税收、人才等方面给予重点支持；二是鼓励机构投资者、房地产开发企业、物业管理企业等投资机构化长租房，增加市场供给，满足市场需求；三是鼓励国有企业投资营运长租房，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引导作用。

再次，要完善住房租赁产业政策。一是鼓励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专项贷款支持，并给予长周期低息贷款，为新建、改造的租赁住房提供多渠道、制度化的长期融资渠道。二是完善住房租赁税收政策，降低长租房企业税负。

三是对住房租赁企业实行财政补贴政策。对备案的住房租赁企业、进入住房租赁交易服务平台以及租赁合同备案的企业进行分类财政补贴。在一线、新一线城市中的净流入人口、租房人口较多的地区，鼓励多套房的个人房东将闲置房屋委托给专业住房租赁企业进行出租，可给予房产税减免。

最后，还要加强住房租赁市场监测体系建设，夯实住房租赁监管和风险管控基础。一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加快构建长租房市场风险防范机制，对长租房企业特别是包租的住房租赁企业、房地产经纪机构的资金实行分类分级管理，防止出现“爆仓”、“跑路”等行为，切实防范住房租赁金融风险。二是完善“互联网+租赁”信息管理平台，实现租赁数据资源互通共享，形成管理合力。三是加强对住房租金的合理管控，保持市场租金水平处于合理范围内，防止出现租金过快上涨的情况。四是加快建立租赁企业信用评价体系。

南都：跟政府主导的保障性租赁住房不同的是，“市场化、机构化长租房”是由专业化住房租赁企业主导运营、通过一系列标准化改造后投入出租市场。就您的观察来看，当前机构化长租房的发展处于一个怎样的阶段？

周洪宇：截至去年的数据显示，中国租赁人口约有 2.2 亿，占流动人口总数的 90% 左右；长租房市场规模达到 1.73 万亿元，但相关市场秩序仍待进一步完善。

在当前中国的住房租赁市场中，尤其在一线城市，机构化长租房占比仍相对较低，不足 5%。在出租过程中，传统中介、个人房东出租，也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房源不透明、租期难保障等痛点问题，致使相关部门在管理上产生“管不到、管不住”等难点。

目前长租房已成为缓解大城市居住问题的关键，相关的住房租赁企业也正向更加专业化的方向迈进。现阶段，还是要进一步加大力度培育专业化住房租赁企业，提高机构化长租房的市场地位。

南都：我们关注到，上海、武汉、苏州等城市陆续出台政策鼓励“起居室改造出租模式”，即“N+1”的规范发展，以此扩大租赁住房供给、平抑单间租赁住房租金，您觉得这一模式是否可行？

周洪宇：在超大、特大城市合理规范“起居室改造再出租”的模式，也就是“N+1”的规范发展，能有效增加单间、小户型房源供给量，提高单套租赁住房使用效率，降低单位租金标准、缓解年轻人租金压力。应该鼓励多种形态，扩大租赁住房供给，支持在人口净流入大、租房需求大的地区进行模式试点。

武汉市有很好的先例，房管局通过对“起居室改造再出租”模式的运用，增加了租赁住房供应、减少了租客居住成本、房东和长租房企业收入也得到适当提高，实现了多方利益平衡。

北京对该模式还未开放，建议充分借鉴其他地市经验，加强政府层面在管理上的沟通交流，持市场开放态度在租房需求大的地区尝试模式试点。

需注意的是，此模式在改造过程中，应将个人房东、黑中介的隔断群租房，与长租机构根据一定建筑安全标准改造的“N+1”进行明确的区分界定，并明确改造的建筑、施工、消防等多项标准，对符合标准的起居室改造房予以保留并监管，对不合规的限期整改，拒不整改的责令拆除。

在更大范围的推广过程中，应鼓励专业化规模化住房租赁企业参与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建立住房租赁行业信用评级机制，培育样板机构。

南都：此前一些长租企业“爆雷”的问题曾引发关注，您对防范风险、让行业走向规范发展还有哪些建议？

周洪宇：规范并加快长租房市场发展，对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持续发展，保障租客的居住权，提升人口城市化质量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建议，一是要持续提高机构化长租房占比，支持专业化住房租赁企业发展。二是鼓励探索多种模式有效有序扩大市场供给。专业化规模化住房租赁企业通过对存量住房标准化改造，有效激活住房租赁市场活力，提升居住生活品质。三是加快落实全面备案制度。政府相关部门要明确对住房租赁市场管理的统一出口，形成功能互补、良性互动的工作机制，提高管理效率。同时，对住房租赁企业、中介机构、个人房东做到分类分级管理，鼓励个人存量住房交由住房租赁企业统一管理、出租、备案，不仅能规范长租房市场持续健康有序，也能在提高居住品质的同时扩大租赁住房供给量。

教师减负存在“此减彼增”现象

来源 | 羊城晚报



今年是“双减”政策落地的第二个年头。长期从事教育研究工作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周洪宇调研发现，“双减”之后，中小学教师的负担需要减轻。

“随着课后服务实现全覆盖，有部分学校反映，教师负担明显增加，工作时间明显延长。”周洪宇将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提出，“要合理减轻教师负担，为教师提供有效激励与保障”。

教师义务负责课后服务不是长久之计

羊城晚报：您今年打算提多少件议案、建议？

周洪宇：目前一共是 27 份，其中涉及立法的议案有 6 份，建议 21 份，

这是初步考虑。当然，到北京之后，随着对一些问题的关注，（数量）可能还会略有增加，但我还是想控制在 30 份以内，跟往常差不多。

羊城晚报：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涉及教育吧？

周洪宇：大约有 40% 涉及教育领域，毕竟我长期都在教育领域工作。特别是“双减”之后，我带领我们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和长江教育研究院这两个重要的教育智库，在东、中、西部 6 个省份，对 130 余所中小学的 1 万多名学生进行调查。

我们发现，一方面，“双减”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另一方面，“双减”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或者说困难。针对这些问题、困难，我们专门组织专家撰写了一份《关于进一步推进“双减”政策落地构建良好教育新生态的建议》。

羊城晚报：大家平时提得比较多的是减轻学生负担，学生负担减轻了，按理说老师负担也会相应减轻。

周洪宇：理论上是这样的，但要执行“双减”任务，最后任务还是落到了教师头上。“双减”政策强调，学校要“提升学校课后服务水平，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最后基本还是本校教师去承担提升课后服务水平的任务。要给予教师一定的激励保障，否则，教师搞义务劳动，也不是长久之计。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教培市场规模正在收缩，学校作为教育主阵地的作用进一步强化，教师需要在工作上付出更多时间和精力，承担更多无形的职业成长压力。所以，我提出要合理减轻教师负担，并且为教师提供有效激励与保障。

教师减负存在“此减彼增”现象

羊城晚报：此前，全国多个省份已出台了教师减负措施和清单，这些措施是否“够用”？

周洪宇：2019 年 12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截至 2021

年2月底,已有2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陆续出台了中小学教师“减负清单”。

然而,“减负清单”之外存在隐藏负担,实施过程中存在“此减彼增”、减负的“度”把握不准、“减负清单”实施的监督力度不足等问题。

羊城晚报:“此减彼增”现象多见吗?

周洪宇:文件的出台是一回事,文件的实施、落地还有一个过程。清单上明确不应该由教师来承担的事项可能被“减”下去了,但后面可能又来了一些其他工作,这些工作又被“拴”在了教师头上。

比如,过去有的地方要教师填写社会上的各种表格或统计数据,现在文件可能把这些内容给“砍”下来了。但一些别的部门可能认为有的工作必须由教育系统来完成,最后教育部门又交给了教师,这是一种隐性的负担。

其实,教师减负是为自身质量的大提升做准备,也是为学生高质量发展铺路。

建议将教师课后服务作为表彰参考

羊城晚报:合理减轻教师负担,怎样才算“合理”?又该怎么“减”?

周洪宇:我认为,教育部门应协调运用政策工具,均衡分配政策主体,优化评价方式。我建议进一步优化中小学教师绩效工资方案,确保课后服务经费主要用于参与课后服务教师和相关人员的津补贴,将教师参加课后服务的表现作为职称评聘、表彰奖励和绩效工资分配的参考。

羊城晚报:在具体的减轻教师负担的方式上,有哪些措施可以用?

周洪宇:首先,可以依据校情,试行新的考勤制度。一方面,要统筹安排教师课表,可以在不影响正常教学的前提下试行“弹性上下班制”。

另一方面,学校可探索建立“延时服务积分制度”,对参与延时服务的教师积分,以月或双月为单位,实行等同时间“调休”。当然,“调休”“弹性上下班制”绝不可“一刀切”,要依据校情而定。另外,需明确规定某几个时间不可“弹性”,如学校明确规定的集体备课时段、全体教师集体会议、区内统一的各学科教研活动时段等。

借助社会力量也是一种方案。比如，可以积极探索与少年宫、博物馆、科技馆、周边专业场馆等的合作，让多种“课后服务”模式并存；再比如，尝试引入校外教育机构力量，很多培训机构有丰富的教学资源，艺术类、素质类机构完全可以加入到校内的教学实践中来，丰富校内“课后服务”内容。

上级部门应协调统筹相关资源，通过公开招标引入一些有资质、有水平的机构供学校选用，同时还要进一步明确与规范相关收费标准。还有，可邀请一些退休老师、家长及有资质的社会专业人员等志愿者参与进来。

在管理上，要帮教师做好“减”法，让教师有足够的时间研究教学、提升教学效率和质量，学生减负才能落到实处。



建议出台国家层面非学科类培训管理规范，尽快制定《校外教育培训管理条例》

来源 | 21 世纪经济报道

“双减”政策落地至今，取得了初步成效，培训市场虚火大幅降温，作业总量和时长得到有效控制，课后服务基本实现全覆盖。

今年全国两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院长周洪宇准备了多份建议，从持续深入开展隐形变异培训问题治理，加强对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管理，合理减轻教师负担并提供激励保障，尽快制定《校外教育培训管理条例》等方面，对深入推进“双减”提出建议。

周洪宇在接受 21 世纪经济报道专访时表示，下一步加强对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监管，首先要制定行业规范指导意见，明确主管部门。他还认为，校外教育培训治理的政策越来越完善，机制越来越健全，现在校外教育培训监管立法的时机已经成熟。

积极引导校外培训机构转型

《21 世纪》：在深入推进校外培训机构治理过程中，出现了“一对一”“高端家政”“众筹私教”“住家教师”等隐形变异违规行为，你认为应该如何加大查处力度？

周洪宇：总体上来说，查处变相违规开展学科类校外培训问题要纳入社会综合治理范畴。要将学科类培训隐形变异问题查处工作纳入省、市、县和乡镇（街道）网格化综合治理体系，充分发挥社区综合治理功能，开展区域巡查执法。面向各地各行各业选聘校外培训社会监督员，组建公众监督队伍参与校外培训治理。

要落实属地管理，各地要按照“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对学科类培训的隐形变异问题进行查处。各地要充分发挥“双减”工作专门协调机制作用，

强化部门协同、条块联动，压实责任。

要畅通投诉举报渠道，拓展问题线索来源，强化社会监督。要创新监管方式，推进“互联网+监管”，会同相关部门，探索将违规培训的机构和个人信息，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实施联合惩戒，坚决防止隐形变异违规培训行为蔓延。

《21世纪》：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大大压减，应该如何支持引导培训机构和人员转型？

周洪宇：“双减”政策落地，应积极引导校外培训机构及校外培训教师转型。

一是充分利用校外培训机构的资源、场地和人员优势，通过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让校外培训机构为学校提供优质规范的教育服务，特别是为薄弱学校提供完备设施、教学改革、课程开发、管理优化和课后服务。

二是针对有特别需要的地区与学校适当放宽应聘条件或增加专门面向校外培训教师的教师编制名额，遴选出有志于教书育人且专业水平高的人才。

三是以学校外聘的形式，聘请有专业资质的从业人员为学生提供课外辅导和兴趣课程，尤其是计算机编程、STEM等创新实践型课程。

出台非学科类培训分类管理规范

《21世纪》：教育部表示将把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监管作为新的工作重点，进一步完善监管体制，明确标准要求，加强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监管。对此，你有什么建议？

周洪宇：治理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首先要明确主管部门。目前全国已经有21个省份明确了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的相应主管部门，但仍有多个省份没有明确主管部门。

目前，除了国家体育总局发布了《课外体育培训行为规范》，浙江等部分省市和个别试点地区的文旅部门、科技部门会同教育部门发布了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管理规范外，大量存在的体育类、文艺类、科技类培训机构暂时缺

乏国家层面的行业规范指导意见。大部分省份未出台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的分类标准和审批流程。

要从国家层面出台非学科类校外培训分类管理规范，分类厘清教育、文旅、体育、科技等部门的监管事权，推动有关部门加强对体育、文旅、科技等非学科类培训的日常管理，形成协同管理的合力，实现常态化监管，全面规范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招生宣传、培训内容、财务收费、安全管理等。

在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的监管问题上，要加强资金监管和价格监管。培训机构应缴纳预收费风险保证金，最低额度应该不低于培训机构收取的所有学员单个收费周期的费用总额。有关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要加强价格管理，遏制非学科类培训市场营销急速升温、价格过快上涨，减轻家庭经济负担。

《21世纪》：随着体育、艺术进中考和大学招生，一些相关的非学科类校外培训也有了“应试”色彩，可能会引发社会焦虑，对此应如何有针对性地加强监管？

周洪宇：学科类和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的区分本来是很清楚的，但是随着体育、艺术进入考试的范畴，使得本来注重素质教育的相关非学科类校外培训也可能应试化。以体育类培训为例，从积极方面来讲，这有利于提升学生体育健康素质，从消极方面来说，又可能过于注重考试技能培训。这属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我们应该尽早发现苗头，尽早纠偏。

当然，应试化的非学科类校外培训和学科类校外培训性质不同，对于监管部门来说，应该加强引导，避免出现过多负面效应。

有的放矢地制定监管办法

《21世纪》：《教育部2022年工作要点》提出，推动校外教育培训监管立法，这对于深入推进“双减”有何意义？

周洪宇：推动校外教育培训监管立法，是指在现有对校外培训主要进行行政管理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依法监管校外培训机构奠定充分的法律基础。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强调将教育培训作为重点加强的执法领域。2021年11月，教育部为教育部机关首批取得行政执法证的人员颁发证件。

但目前我国法律体系中关于校外教育培训具体的相关法律仍有待完善。《民办教育促进法》更多针对民办学历类学校，对校外培训的法条较少。《教育行政处罚暂行实施办法》亟待修订。立法完备是执法工作的有力基础。推动校外教育培训监管立法对于深入推进“双减”政策实施，依法治理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具有重要意义。目前还难以一步到位制定专门的法律，我建议尽快制定《校外教育培训管理条例》。

《21世纪》：你认为制定《校外教育培训管理条例》应该包括哪些主要内容？

周洪宇：这部行政法规要对校外教育培训管理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管理部门权责、协同联动方式、家长学生权益保障、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条例的监管对象比较复杂，既有公办机构也有民办机构，既有营利性机构也有非营利性机构，既有学科类机构又有非学科类机构，性质、类型、层次不同，产品服务多样化，因此要针对性地设计准入标准，有的放矢地制定监管办法。

还要加强对校外教育培训教学服务质量的分级管理。因为校外教育培训的对象、内容、形式各不相同，目前没有统一的教学标准。很多家长、学生不清楚什么样的校外教育培训才是真正有质量的教育，所以要建立符合不同类型校外教育培训特点的教学服务质量监管体系，明确标准要求，加强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监管。湿地具有多种功能和价值，被誉为“地球之肾”“淡水之源”“物种基因库”和气候变化的“调节器”。我国湿地面积居世界第4位，涵盖了《湿地公约》所有的湿地类型，在维护全球生态安全、保护生物多样性上占有重要地位。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进湖北省委会主委周洪宇提出了关于构建多元化湿地保护修复生态补偿机制的建议。

构建湿地保护修复生态补偿机制

来源 | 中国社会科学报

《中国社会科学报》：生态补偿是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和湿地生态保护之间矛盾的重要手段。当前，我国生态补偿机制建设取得哪些成效？还有哪些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

周洪宇：我国对生态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治理及生态补偿工作非常重视。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推进生态文明建设。2021年10月25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的意见》，促进社会资本参与生态建设。《湿地保护法》已由全国人大颁布并将于2022年6月正式实施。

我国已经逐渐建立起分级分类、多元化的生态补偿管理机制，建立大江大河流域层面横向湿地生态补偿机制，实施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和生态补偿机制试点。此外，在湿地生态修复投入、环境质量补偿、生态产品价值补偿以及流域水环境生态补偿等领域，也进行了有益尝试和探索。与此同时，我国生态补偿机制建设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生态补偿投入和投融资渠道不足，缺乏科学价值评估和统一标准，管理职责分散、协调机制不完善等。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如何更好地构建多元化湿地保护修复生态补偿机制？

周洪宇：首先，要建立多元化资金筹集和投入机制。一是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通过纵向财政转移支付，提高对生态修复、生态工程建设的专项财政拨款、财政贴息和税收优惠等财政支出比例，在政策安排上向自然保护区、重要生态功能区倾斜，建立纵向投入长效机制。二是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充分吸收转移支付资金、绿色金融资本以及社会公众捐款。三是转变生态补偿方式，从“输血型”直接补偿向“造血型”间接补偿转变。

其次，完善我国湿地生态补偿政策和标准体系。建议由国家林业和草原

局牵头、水利部和其他相关部委参与，加快建立完善湿地生态补偿政策体系，形成一套衡量湿地生态服务价值和作用的计算方法，构建湿地保护融资方法体系，促进湿地周边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再次，强化生态产品和市场化价值的生态补偿和投入保障。建议自然资源部门进一步完善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制度，鼓励利用自然资源优势发展特色产业，打通“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双向转化通道。为保障生态补偿顺利开展，应引入交易成本低、操作性强的市场化补偿模式。通过完善权责制度，为建立市场化生态补偿提供制度保障；探索现代生态产业发展路径，打造绿色生态品牌，通过政策扶持、技术服务等形式，促进试点区域接纳和汇聚优势产业。

最后，健全公众参与的自然资源使用和生态补偿监督管理机制。社会公众、环保公益组织作为生态资源的使用者和受益者，有保护生态环境的权利和义务，应积极参与生态补偿机制建设。建议相关部门利用各种宣传渠道，加强对生态补偿相关政策的解读，加大生态补偿信息公开力度，不断提高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



办高质量教育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

来源 | 中国教育报

“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地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10年后，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我国有2.9亿在校学生，要坚持把教育这个关乎千家万户和中华民族未来的大事办好”。

“教育历来都是政府工作报告民生工作中的第一项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华中师大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院长周洪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既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也是民生之基。”

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更高质量的教育

“中西部地区及边远地区的教育变化是有目共睹的。”在全国政协委员、青海民族大学师范学院副教授李莉娟看来，各类教育学位持续扩增，在边远地区深入实施学前教育振兴行动，义务教育“双减”政策有效落实，全面消除了超大班额，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稳步推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历史性地解决了“有学上”问题，教育公平实现了新跨越。“如今，人民对公平接受教育、接受更加优质教育的需求有了更高的期待。”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安阳市教育局局长黄艳说出了老百姓的心声。

更高质量的教育，必须优先保障“底部”需求。

针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关于让外来务工者随迁子女都能公平享受九年义务教育的建议”，教育部明确答复，从2021年起，各地均不得要求家长提供计划生育、超龄入学、户籍地无人监护等证明材料，精简不必要的证明材料，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仅凭居住证入学。

对留守儿童、残疾儿童、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等急需服务的群体，多个省份明确，在中小学课后服务中优先保障。

更高质量的教育，必先回应新时期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我们已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周洪宇说，如何巩固和拓展教育脱贫攻坚成果，如何有效衔接国家乡村振兴战略，是我们教育面临的重要任务。

2021年5月，教育部等四部门印发《关于实现巩固拓展教育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明确提出4项任务：义务教育有保障、经济困难学生帮扶机制、做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完善巩固拓展对口帮扶机制，每一项措施都直接回应了人民群众对新时代乡村教育的呼声。

更高质量的教育，必从规模发展向内涵发展转变。

“到2025年，县中整体办学水平显著提升，市域内县中和城区普通高中协调发展机制基本健全，统筹普通高中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推动全国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92%以上。”去年12月发布的《“十四五”县域普通高中发展提升行动计划》，对县域普通高中发展提出了具体目标。

“县域普通高中的高质量发展，对乡村振兴战略及促进带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至关重要。”全国人大代表、东北师大附中校长邵志豪建议，在人力方面，特岗教师计划、职称评聘、专业培训等要向县域高中教师倾斜；在财力方面，保障好县域高中教师的工资与待遇，保障好学校的办学资金；在物力方面，改善办学条件，增加县域高中的现代化信息化办学设备。

“做强存量、做优增量，让职业本科教育成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全国人大代表、浙江金融职业学院院长郑亚莉告诉记者，“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对已经升格或合并的职业大学来说，要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对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来说，要支持升格。”

以人民为中心，回应“急难愁盼”

“截至2月15日，各地共排查非学科类培训机构18.48万个，发现恶意涨价机构52个，相关违规问题已经整改，对相关机构进行了严肃处理，培

训费恶意涨价部分已全部退还家长。”近日，教育部针对社会反映强烈的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存在的问题，迅速行动、集中整治、立行立改。

人民有所呼，教育有所应。

“双减”政策发布以来，19个部门建立了“双减”工作专门协调机制，相继出台30多个配套文件，校外学科类培训大幅压减，校内服务有效提升。

在河南省安阳市，社会上的教育专业力量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课后服务。“我们也引入了本地高等教育资源。”黄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安阳市教育局积极与本地高校沟通，在思政一体化、课后服务、心理健康教育等方面引入专业力量，满足了家长与学生的需求。

“双减”，不仅减去了过重的学业负担，更减去了盲目焦虑的浮躁，让教育焕发本色。

从这学期开始，周一至周五18时至21时，北京市所有初中学生都可享受免费的在线辅导。利用“互联网+”，北京市为学生提供更为精准、个性、多样的教育服务。

“当前，人民群众对教育的需求进入了一个高速增长期，不仅希望获得职业发展所需的知识与技能，还要获得自身发展、创造美好生活的能力。”周洪宇说，“学生和家长希望能选择适合的教育，希望教育内容更加丰富多样，学习更加便捷自主。”

教育发展要得到人民认可，就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多样、特色、优质教育的需求。

与此同时，在关于“双减”落地、乡村教育发展、学前教育普及普惠等一件件老百姓心头所系的教育期盼上，人民教师使命在肩。两会期间，代表委员纷纷对此建言献策。

“要让农村边远地区和民族地区的孩子上好学，首先要保证配全配齐专业的音体美教师，其次要解决边远地区、民族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结构性缺编的问题，使学校良性循环。”李莉娟强烈感受到农村老百姓对高质量教育的期盼。

“双减”背景下，如何保障课后服务中的教师权益？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六盘水市实验小学教师吴明兰呼吁：“对教师额外付出的劳动给予合理报酬，并根据教师工作成果，建立对教师的奖励激励制度。”

此外，针对幼儿园教职工的待遇保障工作，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教育厅副总督学杨善竑建议：“进一步加大财政拨款和专项补助，解决非在编教师和民办幼儿园教职工的‘五险一金’，提高工资收入水平，逐步实现同工同酬。将幼儿教师纳入乡村教师生活补助范围，按一定比例设置岗位津贴，确保乡村幼儿园教师能留得住。”

以人民为中心，促进全面发展

在海南，田园耕作让学生们养成良好劳动习惯；学校开设的烹饪课程让每个孩子都能做几道特色菜肴；劳动教育综合实践基地让学生们在探索实践中进一步提升创新意识、创新能力……

教育，要关注人的发展，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

“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是立德树人的落实机制。”在邵志豪看来，需要设计一个多层面、多系统协同发力的实践框架，抓住小初高衔接环节和家校社合力环节，做好人员保障体系、管理保障体系和评价保障体系，构建完善的“五育”课程体系和“五育”活动体系。

新时期，以教育评价改革为牵引的教育改革，正在对全社会开展一次教育观念的启蒙。

山东省潍坊市对中考招生评价建立“多次考试、等级表达、综合评价、多元录取”制度，深化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改革，建立“量表+标志性成果+基本”机制，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伴随中高考改革进入深水区，考试评价的育人导向作用更加突出。

“我们要看到，改革的核心是教育价值观的改变。”今年两会，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倪闽景也带来了这方面的思考——在学校层面上，课程内容、教学方式都需要调整。另外，引导学生全面发展，还需

要学校、家庭、全社会共同努力。

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家、校、社正在重新认识教育规律，回归教育理性。

“因材施教的‘教’，不是教学而是教育。”倪闽景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教育故事——物理课上遇到的一名腼腆羞涩、不敢发言的学生。下课后，他将这名学生带到操场上，反复鼓励他大声说出来。此后，这名学生的课堂发言令人“惊喜”不断。“要因人而异开展教育，教师需要敏锐感受到孩子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困难，帮助孩子全面发展。”倪闽景说。

人，始终是教育的中心。

“学生的生理条件、心理条件、智力条件等都存在差异。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在全国人大代表庾庆明任职的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第二中学，每年新生入校后，教师都会认真观察学生各方面的表现，本着扬长避短的原则，鼓励学生培育优点、增强自信、树立理想，并为学生提供多条成才的路径。作为校长，庾庆明说：“我们应该以更广阔的眼光来看待教育，拓宽学生的成材渠道，培养有健康身心和积极情绪的人。”

“发现差异、尊重差异，努力使不同性格禀赋、不同兴趣特长、不同素质潜力的学生能接受符合自己成长需要的教育。”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教育厅厅长葛道凯说，“要促进每名学生获得发展自身、奉献社会、造福人民的能力。”



分类厘清监管事权，提高非学科培训准入门槛

来源 | 新京报

3月3日记者获悉，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今年将关注教育“双减”问题，建议从国家层面出台非学科类分类管理规范；对培训机构预付费保证金和后续设置专门的银行托管监管账户提出相关要求，提高行业准入门槛。

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召开在即。3月3日记者获悉，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今年将关注教育“双减”问题，建议从国家层面出台非学科类分类管理规范；对培训机构预付费保证金和后续设置专门的银行托管监管账户提出相关要求，提高行业准入门槛。

“双减”改革启动以来，学生和家长的负担有效减轻，市场环境得到净化，培训行业正在朝着规范、有序、健康的道路发展。周洪宇指出，随着校外培训治理工作的深入推进，一些地方出现了非学科类培训日常监管不到位、部分机构资质不全、培训人员鱼龙混杂、预收费监管不完善以及部分培训机构借“双减”之机肆意涨价、过度营销、制造社会焦虑等问题。

周洪宇注意到，部分相关行政部门尚未全面、有效承担起对全国的指导和监管责任。“目前全国已经有21个省份明确了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的相应主管部门，仍有多个省份没有明确主管部门；大部门省份未出台非学科类培训机构分类设置标准和审批流程。

此外他指出，除了国家体育总局发布了《课外体育培训行为规范》，浙江等部分省市和个别试点地区的文旅部门、科技部门会同教育部门发布了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管理规范外，大量存在的体育类、文艺类、科技类培训机构暂时缺乏国家层面的行业规范指导意见。此外，部分体育、艺术类培训项目需求较为旺盛，价格较快上涨，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双减”成效。

对此周洪宇建议，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严格审批，除对基本的办学许可证、

办学场所面积、开办资金、消防许可、师资配备提出要求外，也要对培训机构预付费保证金和后续设置专门的银行托管监管账户提出相关要求，提高行业准入门槛。

在日常监管方面，周洪宇提出，从国家层面出台非学科类分类管理规范，分类厘清教育、文旅、体育、科技等部门的监管事权，推动有关部门加强对体育、文旅、科技等非学科类培训的日常管理，形成协同管理的合力，实现常态化监管，全面规范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招生宣传、培训内容、财务收费、安全管理等。

同时，周洪宇建议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将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全额纳入监管范围。培训机构应缴纳预收费风险保证金，最低额度应该不低于培训机构收取的所有学员单个收费周期（3个月）的费用总额。学员缴纳的学费必须打到监管银行的指定账户，课消三个月后经过申请才能打到机构账户。

此外，他建议，有关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加强对培训机构的价格管理，遏制非学科类培训市场营销急速升温、价格过快上涨，减轻家庭经济负担，确保“双减”政策见效。



小学要不要上6年？人大代表议学制改革

来源 | 南方周末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教授甘华田：把小学六年制改为五年制，保留初中三年制，普通高中三年制改为两年制。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周洪宇：主张将现行的“六三制”改为“五四制”，并允许在局部地区试行“五三制”。

“要缓解‘教育焦虑’，关键在教育体制改革。”全国人大代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教授甘华田在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提出建议：尽快推进九年制义务教育体制改革，缩短学制、取消中考、普及高中，实行小学到高中的十年制基础义务教育。

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周洪宇看来，“‘学制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只能循序渐进，不能过于冒进。”



上海杨浦区一小学校，放学时门前挤满了前来接孩子的家长，人行道旁停满了各种自行车和电瓶车

周洪宇也准备了一份《关于深化新时代学制改革的建议》，提出在部分地区试点“五四制”“九年一贯制”等灵活多样学制的主张。他指出，学制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师资、课程、教材、校舍、设备以及经费支撑等，需要社会形成共识、修改相关法律法规。

小学学制是否要缩短

学制改革之争并非第一次出现在全国两会上。不少代表委员此前就提出，与之前相比，当下儿童成熟更早，小学六年制太长。还有代表委员表示，初中、高中的第三年都是为了中考、高考刷题复习，课程内容其实两年就能完成。

甘华田对学制改革提出的具体制度设计是，可通过调整课程设置与教材内容，把小学六年制改为五年制，保留初中三年制，普通高中三年制改为两年制。

在他看来，实行小学到高中的十年制基础义务教育，比现行实施的九年制义务教育仅仅多了一年，就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水平和财力来说，完全不是问题。更重要的是，通过十年制义务教育获得的知识储备，已满足绝大多数高等教育专业要求。

周洪宇指出，当前社会各界认为学制要调整的主要矛盾不应该简单地聚焦于缩短时间，而在于将这些时间用在了应试上，不是真正符合人们对教育培养人才的期待。

周洪宇也赞同缩短小学年限，认为现行小学六年学制太长。但他提出的学制改革新主张是将现行的“六三制”改为“五四制”，并允许在局部地区试行“五三制”。

目前，中国大多数地区在义务教育阶段实行“六三制”，部分地区实行“五四制”。“五三学制”是一种实行小学五年、初中三年的实验性学制，长期以来在一些省市尤其是许多农村地区广泛存在，但随着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明确我国实施九年义务教育，意味着这种学制只能在一定时期内过渡性存在。

周洪宇认为，目前“六三制”占主导的一统天下的学制体系是需要改变的。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如“十四五”期间将全国极少数“五四制”实验学校扩大

到占一半，能使学制更加灵活多元、富有弹性。

周洪宇还提出，“九年一贯制”实验学校，更有利于培养人才，减少升学压力，减少时间浪费，提高培养效率。最好要加快建设“九年一贯制学校”。

职业教育如何调整？

学制改革中有一块内容容易被社会所忽略，那就是“中等职业教育制度”，即主要在高中阶段培养中级技术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及其他专业人员的职业教育。中等职业学校教育接收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毕业生，学制三年，是职业教育体系中的重点。

近些年来，普职分流问题一直备受关注。不少家长难以接受孩子在高中就被分流到职业学校。

甘华田就提出伴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未来工厂企业需要的是开“数控机床”的高级“蓝领”，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技术工人。初中毕业后就进入职业教育，学生的知识储备不足，达不到未来智能制造业需要高级“蓝领”的要求，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因此他认为，取消或减少中等职业教育，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十分必要和紧迫。

但周洪宇指出，现在学生和家長不愿就读职业学校的根本原因在于，读职校出来地位不高。虽然一些特需人才的经济地位有所提高，但社会地位还是容易被轻视。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是提高职业教育地位，强化职业教育在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学制中的“地位”。

“‘中等’主要指高中职业教育，应进一步加强与优化，根据近年中央文件要求，在原则上普职比1:1，大体各占一半，但不同地区尤其是农村边远贫困地区的普职比应有不同安排，其初中最后一年可适当增加职业教育内容。”周洪宇认为，这对一些农村地区学生来说，是增加应用技术教育的一种方式，有利于向职高过渡衔接，明确自己的学习、就业方向。

另一方面，对于职业教育的升学路径，周洪宇觉得，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已不能满足当下的人才培养格局，他建议为高职、高专学生设立“副学士学位”。这有助于推动职普互通，增强大众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度和吸引力。

要“双减”，不要增加教师负担

来源 | 潍坊晚报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进湖北省委会主委周洪宇始终把目光聚焦在中国教育改革这一重大命题上。从课堂到大会堂，20年来，他用一份份来自基层的调研和建议，持续为教育事业发展鼓与呼。

在刚刚过去的2021年，“双减”是教育领域最热的话题。参加今年两会时，周洪宇带来了5份针对“双减”的建议，核心都是“减负增效”，旨在让“双减”政策真正落地见效。

周洪宇抓住了“一减一增”中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学生从沉重的课外负担中解放出来了，但作为“双减”主力军的一线教师，身上的负担却更重了。



基层教师是教育系统“直接面对人”的环节，关乎教育大局，直接影响“双减”工作的落实效果。周洪宇提出，减负对教师和学生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过重的职业负担制约着教师个人素质的提高，归根到底，受影响的还是孩子。

“一天几乎一刻也闲不下来”

近年来，全国和地方两会代表委员始终关注“给教师减负”。2019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文，明确要求清理、规范影响中小学教育教学活动的各项工作，特别是与教育教学无关的事项。随后，各地教育部门纷纷拿出“教师减负清单”，确保中小学教师潜心教书、静心育人。

2021年7月24日，《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简称“双减”意见）发布。为落实“双减”，许多学校开始探索、发展课后服务、延时服务、作业管理等。在调研中，周洪宇发现，从全国范围来看，学生负担的确明显减轻，教培市场规模有所收缩，学校作



为教育主阵地的作用进一步强化。这同时意味着，教师需要为工作付出更多时间和精力，教师负担过重的问题再次引发各方关切。

“双减”意见要求，“课后服务一般由本校教师承担”“课后服务时间，指导学生认真完成作业，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进行补习辅导与答疑，为学有余力的学生拓展学习空间”“组织优秀教师开展免费在线互动交流答疑”等。一些学校反映，教师工作时间明显延长，特别是一些班主任、骨干教师与学校管理干部负担过重。

天津市平山道小学校长韩洪涛从教近30年，在他看来，要评估“双减”执行得如何，先要回答教师“想不想、要不要、好不好”的问题。作为天津市人大代表，他在各学校调研走访时，听到了不少一线教师的心声，了解了他们的压力，部分教师还面临生活难题。

他举例说，班主任一般早上7点到校，傍晚6点半下班，回家后再买菜、做饭，还要备课、批改作业……很多人每天工作时长超过10个小时，多至12小时。对班主任而言，由于目前大多数学校都要求学生在校午餐，他们还要负责看护学生午饭，“一天几乎一刻也闲不下来”。

一些年轻教师曾对媒体倾诉，“连谈恋爱的时间都没有了”；还有一些教师不得不面临晚上七八点钟以后到家、自己的孩子无人照顾的困境。

“减负清单”之外，隐藏负担依然存在

周洪宇介绍，上世纪90年代，我国教师负担过重的问题已经暴露出来，“中小学教师被计划、总结、表格挤占了太多教学时间，甚至有教师说只有1/6的时间用来投入教学”。截止到本世纪初，教师的工作负担主要来自学生的学业。

近年来，随着教师内部诉求和外部需求的变化，他们更累了。在地方，教师常常是宝贵的人力资源，于是有的乡镇政府将教师纳入管理体系，并安排不少与教学工作毫不相干的社会工作。一些需要“深造”的教师忙于各类培训、考核，而教师奖惩规定政绩化、数量化、非专业化、行政化的倾向更

增添了这个群体的压力。

近年来，上述情况在政策层面得到了关注，但现有的教师减负政策还未获得社会全面支持和参与。截至2021年2月底，全国已有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列出“清单”，尝试为中小学教师“减负”。然而，“减负清单”之外，隐藏负担依然存在，实施过程中存在“此减彼增”、减负的“度”把握不准、“减负清单”实施的监督力度不足等现象。

例如，某些省份中小学教师“减负清单”减去了应付教育系统外检查的负担，但针对教育系统内部的检查，情况基本没有实质性变化，使减负效果不明显。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新冠肺炎疫情中，一线教师的日常工作内容增加了，如填报大量学生及家长健康信息、传达上级疫情防控要求等。一些学校要求学生入校前上传本人及同住家长的健康码、行程码，由教师逐一核对、提醒家长填报及帮助纠错等。

教师和学生都要“解放”

教师减负，解放了教师；学生减负，解放了学生，“只解放其中一个，无法实现育人方式的变革、教育质量的提高。”周洪宇认为，教师减负是为自身质量的大提升做准备，也是为学生高质量发展铺路。“双减”格局下，中小学教师减负提质要把握好“减中有增”“增中提质”的大方向。

考虑到当前教师的实际需求，今年两会上，不少代表委员提出建议，为教师做“减法”。

民进中央建议，合理减轻教师负担并提供有效激励与保障，包括盘活编内外教师资源、充分利用社会优质资源扩大课后服务供给、探索实施弹性上下班和补充休息制度以及发放补偿性和激励性的加班补助、对表现突出的教师可探索优先晋升职称和评优评先等。

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建议适当增加教师编制，调整义务教育阶段生均公用经费标准，让参与课后服务教师得到有效激励，建

立校外教育机构公共服务购买机制等。

周洪宇也建议，依据校情试行“弹性上下班制”；校社合力，探索“延时服务”的多元模式；做好教师子女的托管工作，减少教学之外工作负担等。

他更呼吁，学校管理上要切忌形式主义。学校的核心工作是教书育人，不要盲目攀比，而要关注教育本身。“无意义的活动不开展，意义不大的少开展。”周洪宇认为，帮教师做好“减”法，而非“加”法，给教师营造一个不浮躁的、安静的工作环境，这样教师才有足够的时间研究教学以提升教学效率和质量，学生减负才能落到实处。



“IT 青年成涉诈 App 制刀者”现象 引发多方关注

来源 | 中国青年报

“传统电信诈骗不断向手机 App 上转移，背后负责程序开发的 IT 青年沦为‘制刀者’和诈骗犯罪帮凶，亟待源头治理。”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提出《关于加大对利用 App 诈骗犯罪治理力度的建议》，10 日下午收到最高法、最高检受理回复。

2021 年 5 月起，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持续追踪调查国内数十起相关案件，推出了系列报道。周洪宇注意到这组报道及相关现象，以此为案由专门撰写了上述建议提交全国人大。3 月 9 日湖北代表团审议两高报告时，他做了加大对利用 App 诈骗犯罪治理力度问题的发言。

“这类新型诈骗手段防不胜防，社会危害性极大。”周洪宇说，伴随数字社会、信息社会的到来，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民众对移动网络、手机 App 依赖度很大，不法分子利用 App 诈骗的犯罪近两年愈演愈烈，比如打着“理财”幌子借用山寨 App 实施“杀猪盘”等。公安部统计数据显示，2021 年一季度此类犯罪已超过电信诈骗的 60%。而受害者一旦“中招”损失惨重，有的受害者不堪打击甚至选择轻生。

不容忽视的是，惨痛案件背后，为电诈团伙提供“技术助攻”的公司，近两年悄然在上海、天津、武汉、长沙等多地出现。

“这些人披着科技公司甚至青年创业团队的外衣，干着危险勾当。从写代码到封装、分发、售后，研发诈骗 App、提供运维等，为诈骗团伙提供一条龙技术服务。”周洪宇介绍。

令他尤为痛心的是，这些“制刀者”大多还很年轻：90 后、IT 男为主，大学以上学历。其中不乏拥有名校光环、硕博学历的高材生，“一旦被抓，将面临‘帮信罪’刑罚，害人毁己。”

据调查，一些涉案 IT 青年落网后，接受调查时往往宣称“没有直接参

与诈骗”或“对参与开发的 App 用途并不知情”。在他看来，“涉诈 App 往往留有可操控数据的‘后门’，作为技术研发人员，不可能不知情”。

这位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分析，一些 IT 青年沦为电诈“制刀者”，与法治意识淡薄、急于“挣快钱”等心理有关。被警方抓捕的武汉光谷晟昌公司技术总监余某，是个 90 后青年，此前月工资 1 万元，参与开发涉诈 App 后，每月进账 4 万元以上。余某坦言：“知道可能违法，但在别的地方也拿不到这么多钱。”

两会前夕，最高检发布 2021 年惩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相关情况。数据显示，2021 年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相关联的网络黑产犯罪增长较快，全年起诉帮信罪近 13 万人，同比上升超 8 倍，位居各类刑事犯罪第 3 位。一些年轻人尤其是在校学生沦为犯罪“工具人”、诈骗犯罪帮凶。

为逃避监管或规避调查，犯罪团伙通过技术外包、购买技术服务等形式，加强犯罪的“技术对抗”。一些技术公司、技术人员违背行业规范和职业准则，对服务对象和项目不加辨别，非法提供技术支持，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经由技术的介入加持，犯罪实施“门槛”大大降低。

“遏制涉 App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提升 IT 青年法治意识，刻不容缓。”此次两会，周洪宇建议，公安部应会同网信、教育等部门加大对利用 App 诈骗犯罪的综合整治力度。

首先要加强源头治理。针对 IT 类专业的青年学生，开展法制教育、思政教育进课堂活动，实施“精准滴灌”，由参与办理相关案件的检察官、法官、民警等以案说法，及早在青年学子心中划清行业“红线”，引导 IT 学生不做涉诈 App 的技术助攻；发挥专业力量参与反诈，变“制刀者”为反诈“战斗员”。

其次，完善法律法规。设立 App 市场准入制度，以及开发、封装、分发等各类主体实名登记备案制度，构建安全可信的信息通信网络环境；制定行业规范、定期开展核查，建立严格的行业准入和退出机制，对涉案专业技术人员实行“黑名单”制度，要求“从业禁止”。

同时，强化监管。网信部门应加强对 App 的监管力度，特别是确立对未
在应用商城上架 App 的监管方式，堵住监管漏洞。

今年全国两会上，“IT 青年成涉诈 App 制刀者”现象引起多位全国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关注，他们呼吁加快颁布实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为
打击治理工作提供有力法律武器。2021 年 10 月，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草案）
已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该草案提出，加强对涉诈相关非法服务、设备、产
业的治理，加强涉诈 App、互联网域名监测治理。

“十分中肯，非常重要”，最高检 10 日对周洪宇代表回复，将认真研究，
持续保持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严惩态势，加大以案释法力度，通过检察建
议、公益诉讼等形式推动相关部门加强行政前置监管，为大局服务，为人民
司法。

“对于这个新情况、新问题，他们都很重视，反应很快、办理及时，体
现了司法为民的初心与宗旨。”这位履职 20 年的人大代表说。



将湖北作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之心”来打造

来源 | 中国旅游报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进湖北省委会主委周洪宇接受中国旅游报记者采访时提出，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长江文化，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是湖北必须履行好的政治责任，应突出湖北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的核心地位，将湖北作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之心”来打造。

据了解，湖北省现有不可移动文物 36473 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68 处。拥有武当山古建筑群、明显陵、唐崖土司城 3 处世界文化遗产，万里茶道等 5 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项目；拥有荆州、武汉、襄阳、随州和钟祥等 5 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28 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206 个中国传统村落。同时，湖北还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之一，是二七大罢工、中共五大、八七会议、黄麻起义、中原突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地。武昌红巷、洪湖瞿家湾、红安七里坪、大悟白果树等地留存着 1772 处不可移动革命文物，15 万件套馆藏可移动革命文物。

周洪宇表示，在长江文化保护传承方面，湖北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如，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文物局）与武汉大学共建成立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侧重长江文明相关学术课题研究和高层次文博人才培养；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全面启动了全省长江文物资源调查工作，旨在全面摸清湖北省长江不可移动文物资源的分布、保存、利用情况，编制全省长江不可移动文物名录，建立全省长江不可移动文物基础数据库；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牵头实施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作为国家文物局重大项目“考古中国”重要组成部分，将廓清长江中游各个区域考古学文化年代框架及发展谱系。这些具体工作为建设好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周洪宇表示，下一步，湖北应深入开展长江流域文化、文物和文化遗产

资源普查梳理工作，建立全面的长江文化资源基础数据库，推介一批长江文化地标和精神标识；通过举办“大河对话”论坛等，加强长江和全球大河流域的交流互鉴，不断提升长江文化的知名度和国际影响力；推动长江文化、文物、文化遗产资源整合和集中连片保护利用，整体谋划长江沿线文化和旅游产业布局，打造长江国际黄金旅游带核心区；鼓励具有市场前景的文化遗产资源与市场相融合，创新“文化+教育”“文化+科技”“文化+创意”等融合模式，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争取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过程中先行先试，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提供经验和借鉴。



建议灵活就业者用法律保护自己

来源 | 央广网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底，我国灵活就业者已达 2 亿人，占 7.5 亿总劳动人口的比重超四分之一。今年，灵活就业再一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对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可能出现的权益损害问题，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周洪宇在《做客央广网》栏目中建议，灵活就业者要学会用法律保护自己。

随着就业观念的变化、企业用工方式的多样化，以及新职业、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发展，我国灵活就业人员不断增加。周洪宇建议：“政府要为灵活就业创造更好的环境、提供更多政策支持，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对这些形态要有各种鼓励的政策。”

那么，灵活就业者的权益应该如何保障？对此，周洪宇强调，要保障每一位劳动者、就业者的合理的权益。遇到歧视、不合理的对待，应拿起法律武器来保障自己的权益。同时，社会也应给各种形态的就业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鼓励、支持、肯定他们，这样才能使就业的形态越来越丰富，使就业者有更多的选择。



长江教育研究院是在湖北省教育厅的大力支持下，由华中师范大学和长江出版传媒集团联合发起，于2006年12月16日成立的教育研究机构。

2016年、2017年连续两年在中国智库索引评选中社会智库类MRPA测评综合排名全国第三，MRPA资源效能测评全国第一。2017年入选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2017年度中国核心智库”。2018年在中国智库索引社会智库类PAI值评分榜全国第二。2019年，荣获中国教育智库联盟“最具影响力智库”称号。我院研究成果《<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实施的现状、问题及对策——中西部6省12县(区)120余所乡村学校调研报告>系列成果》《关于贫困地区贫困生的家庭背景、教育期望教育需求情况的调查与建议》及《疫情对我国教育的综合影响及应对策略系列成果》分别荣获由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联合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共同评选出的2018年度、2019年度、2020年度CTTI来源智库精品成果奖。

目前，长江教育研究院正在按照中央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要求，进一步加强与教育行政部门、科研机构与高校的战略合作，更好地服务于教育改革和发展，力争把自身打造成国内外一流的智库。



联系电话：027-87671389

官方邮箱：cjjy2006@cjjy.com.cn

官网地址：<http://cjjy.com.cn/>

公司地址：武汉市洪山区雄楚大道268号省出版文化城B座6楼